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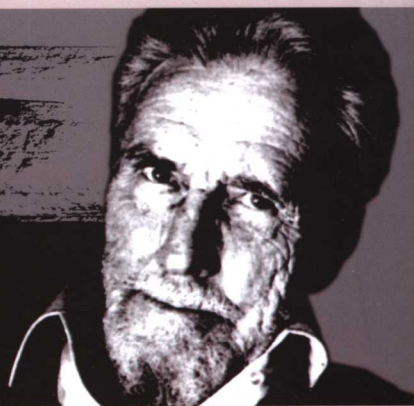


中 学 西 渐 丛 书

乐黛云 主编
陶乃侃 著

庞德与中国

文 化



POUND AND CHINESE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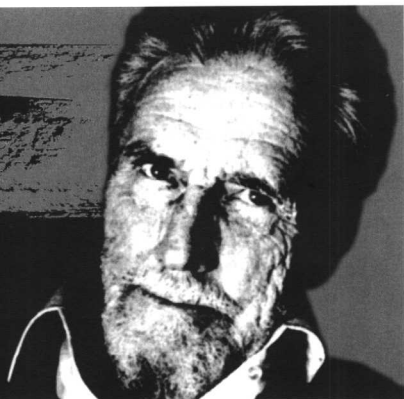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中 学 西 渐 丛 书

乐黛云 主编
陶乃侃 著

庞德与中国



POUND AND CHINESE CULTURE

文 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庞德与中国文化/陶乃侃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7

(中学西渐丛书/乐黛云主编)

ISBN 7-81064-914-0

I. 庞… II. 陶… III. ①传统文化-中国-影响-西方国家 ②庞德,
E. (1885~1972) -诗歌-文学研究 IV. ①G12 ②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9936 号

中学西渐丛书

庞德与中国文化

PANGDE YU ZHONGGUO WENHUA

陶乃侃 著

责任编辑 王 维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cnuph.com.cn

E-mail master@cnuph.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15 插页 2

字 数 242 千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陶乃侃 1977年考入昆明师范学院，毕业留校任教，后获南京大学硕士、悉尼大学博士学位。译有《平凡的土地：美国中西部诗选》、《金色的舞裙》（花城出版社“当代名家小说译丛”之一）。在澳洲文学杂志《南风》、《热》、《文学与美学》及香港《译丛》上发表过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译介。选编并合译的《中国当代八诗人选》将在2006年底以“悉尼大学东亚研究系列”之一出版。有文章在《外国文学评论》、《当代外国文学》、《湖南文学》、《中外文学》（台大）、《澳洲东方研究会学刊》(*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当今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学者：庞德研究专刊》(*Paideuma*)、《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网络学刊》(*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Web Journal*)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另有一文收入英国 Warwick 大学比较文学教授 Helen Dennis 主编的《庞德与诗学影响》(*Ezra Pound and Poetic Influence*)论文集。主要兴趣为中国文学研究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中 学 西 渐 丛 书

卡夫卡与中国文化

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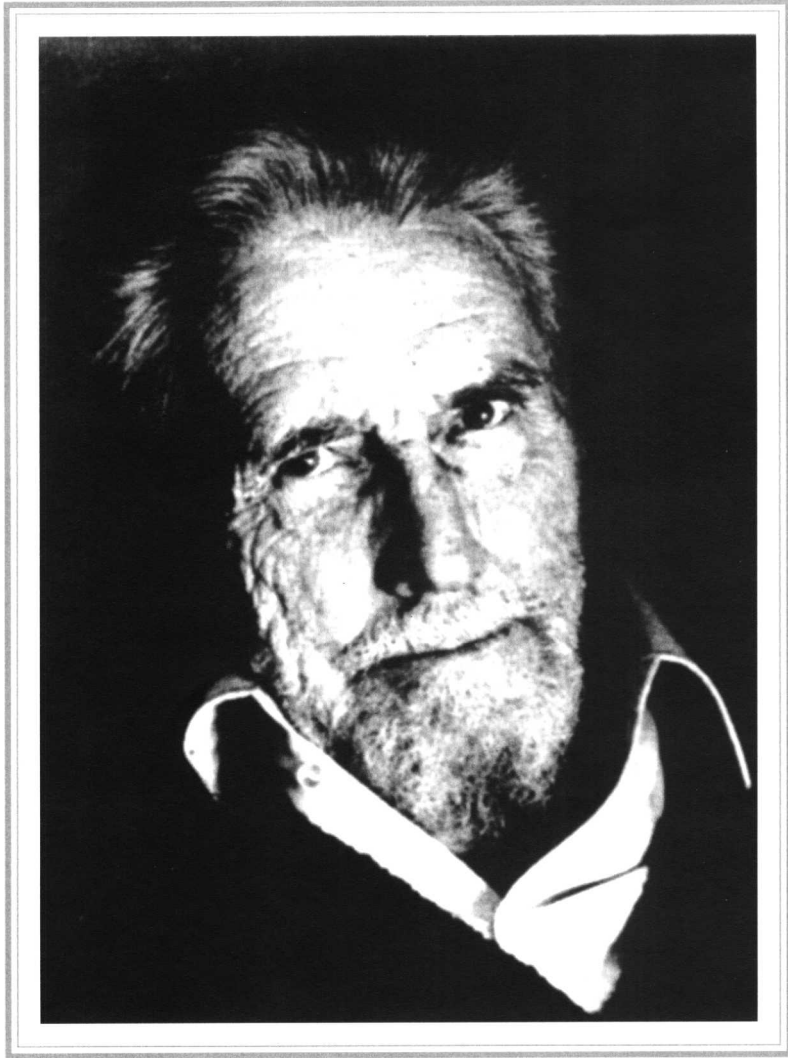
史耐德与中国文化

白璧德与中国文化

庞德与中国文化

责任编辑：王 维

封面设计：王征发



庞德 (Ezra Pound)

(1885 ~ 1972)

内容提要

由于欧洲中心论的缘故，西方学者涉及庞德与中国的关系时，往往回避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大多好考证庞德涉及的中国文史资料。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整体给人的印象是庞德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是考据学问题。然而，庞德却表示对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备至，视中国古籍为“新大陆”，为“宝库”，甚至是现代西方“文艺复兴”的思想之源。这种认识成为庞德终身究读中国古籍的动力。庞德著作不仅有明显的儒家思想影响，而且也有道家思想影响的痕迹。

本书取比较学视角，结合当前主要批评方法，沿中国传统诗学和儒学两条思路，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庞德及其现代主义诗学的影响与意义。全书分五章，考察讨论庞德研究中较为忽视的问题：如庞德的比较诗学、中国文化影响的生成及其发生点、庞德选译《中国诗集》的真实标准和动机、庞德对中国诗律的拒绝与改造、乐府诗与西方叙事诗的内在关系、费氏遗稿及其译介影响的实质意义、《诗章》叙事模式和集合模式的建构、儒家伦理母题的生成及其建构、《诗章》儒学题旨的显隐表现、“潇湘八景”和山水诗对庞德创作的影响等。由此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庞德的创作、诗学、审美、伦理、信仰、思想均有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刺激、影响了庞德现代主义诗学的建构，而庞德的观点与写作实践又为中国文化遗产输入了时代气息和新的生命，使其得以在域外的现代文学话语中流传。这种东西方文化交流相得益彰的共生景观，是对赛伊德“东方主义”的文化霸权论的有力反驳。

总序

乐望云

经历了 20 世纪的两 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原子弹轰炸广岛，经历了“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等无可言状的精神苦难，人类曾梦想 21 世纪将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美好的世纪；然而没有想到头一年就发生了 9.11 这样的恐怖袭击。战乱、暴动、屠杀仍然随处可见。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当然多种多样，然而，深刻的文化冲突不能不说是众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冲突无疑已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前者企图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强行推广他们的意识形态，以图覆盖甚至泯没其他民族文化；后者则采取文化隔绝封闭的孤立政策，不惜以恐怖灭绝手段，维护其停滞与不变，并与一切和他们的看法相悖的力量拼死抗争。随着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强的武器杀伤力及其对自然生态无可挽回的破坏，这种冲突所带来的灾难还会越来越严重。

目前，全世界的有识者都在考虑如何才能化解这一场有可能将人类引向毁灭的冲突。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曾指出：策划和平要比策划战争困难得多。同样，实行引向战争的“对抗”，也比实行引向和平的“对话”困难得多！事实告诉我们，“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死硬派”，恐怕是很难对话，也不大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的。但是，希望仍在于两者之间的、极其广大的、不同层次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人民。他们对文化冲突的遏制和对文化共存的自觉将决定世界的前程。

西方已有学者提出必须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之外，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共生”不是“融合”，也不是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各自保持并发扬自身的特点，相互依存，互相得益。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反对以一种文化打压或覆盖另一种文化，主张多种文化保持“共生”互利的状态，以收和平共处、相得益彰之效。多元文化共生的前提就是各民族对自身的文化有充分的自觉。

近世以来，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文化的地位，西方的文化自觉首先表

现在审视自己文化发展中的弱点和危机方面。早在20世纪初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已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到了21世纪，这种反思和批判达到了更加深刻的程度。例如，法国著名思想家、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①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更是强调，在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有的学者不仅对上述以贪欲和聚敛为核心的文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还进一步指出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应该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②可以说这是西方更深入、更触及精神方面的文化自觉。

如果说西方文化数百年来处于强势地位，其文化自觉在文化多元发展的大趋势下更多地倾向于审视自己文化的危机和弱点；那么，中国文化近百年来，作为一种弱势文化，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轻视和压抑，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就是与本民族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结合在一起。正如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所说，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了解自身文化的种子（基因），也就是民族繁衍生息的最基本的特点；其次，必须创造条件，对这些基本特点加以现代解读，这种解读融会古今中外，让原有的文化基因继续发展，使其在今天的土壤上，向未来展开一个新的起点；另

^① 参见《超越全球化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见《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202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② J. 里夫金：《欧洲梦：欧洲梦是如何悄悄地使美国梦黯然失色》，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2006。

外，还要将中国文化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研究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使其成为正在进行的全球文化多元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过去从未遭遇，也全无经验的一个崭新的领域。

近年来，西方文化显示了对他种文化的强烈兴趣，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们首先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新的参照系，即新的“他者”，以之作为参照，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找到新的认识角度和新的诠释。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①的著名文章！他认为，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角度来考察。在他看来，“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他认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②。他强调指出：“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③

其次，不但是作为参照，还要从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内容。2004年里查·罗蒂访问复旦大学哲学系时说：“我隔了20年再次来到上海，中国的变化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这个奇迹不是改变了我的思考，而是进一步印证和强化了我已有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是未来世界的希望。”^④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多元之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教授特别提出：“弗朗索瓦·于连对于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正好印证了我已经讲过的经由他者的‘迂回’所体现出来的好处。”他还强调说：“从这次研讨会的提纲中，我看到‘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

① 参见《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566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② 参见《迂回与进入·前言》，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③ 参见《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④ 载《文汇报》2004年7月27日。

存与相互尊重。”^①一些美国汉学家的著作也体现了这种认识论的改变，如安乐哲（Roger Ames）和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的《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斯蒂芬·显克曼编撰的《早期中国与古代希腊——通过比较而思》等。类似观点的著作还很多。

另外，改变殖民心态，自省过去的西方中心论，理顺自己对非西方文化排斥、轻视的心理，这一点也很重要。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尼兹教授认为克服西方中心论的过程是一种困难的“苦修”过程。他把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称为“非殖民化学科”。在《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一文中，他说：“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意识中解脱的方式。……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他人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②没有这种自省的“苦修”，总是以殖民心态傲视他人，多元文化的共存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许多先进的西方知识分子提出人类需要的不是一个单极统治的帝国世界，而是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它表达的是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这就是全球的多极均衡，多元共存，也就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的文明”。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一方面回归自身文化的源头，寻求重新再出发的途径；另一方面广泛吸收非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并以之作为“他者”，通过反思，从不同视角更新对自己的认识。这些新发展构成了与过去的汉学（中国学）很不相同的“新汉学”。

反观中国，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特别是汉学（中国学）研究更是蓬勃发展。新世纪以来，出现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14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15卷（天津出版社）等系统总结性的大型综合丛书，引起了广泛关注，前者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大奖。但总的说来，显然研究西方对中国的影响的著作较多，从反方向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影响的专著却相对较少，尤其缺少这方面的综合性系统研

^① 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文化还是文化间性：从形象学到媒介》，载2001年4月“多元之美”大会文献。

^② 阿尔蒙多·尼兹：《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1），5页。

究。特别是对于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因素，更是几乎付诸阙如！事实上，中国文化正是通过伏尔泰、莱布尼茨、荣格、白璧德、庞德、奥尼尔、色加楞、米肖等主流文化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融会贯通，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的。这些西方主流文化的大家并不全面熟悉中国文化，也并不精通汉语，但却从中国文化汲取了至关重要的灵感和启迪。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包括误读、改写、吸收和重建，这种研究不是一般通行的汉学研究所能代替的。这个过程的目的首先都是为了寻找一个外在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但要真正“外在于自己”却并不容易。人，几乎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他们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吸取也就往往决定于其自身的处境和条件。当他们感到自身比较强大而自满自足的时候，他们在异文化中寻求的往往是与自身相似的东西，以证实自己所认同的事物或原则的正确性和普适性，也就不免将异文化纳入本文化的意识形态而忽略异文化的真正特色；反之，当他们感到本文化暴露出诸多矛盾，而对现状不满时，他们又往往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异文化，将异文化构建为自己的乌托邦。从意识形态到乌托邦构成一道光谱，显示着西方文化主流学者对中国文化理解和吸收的不同层面。

本丛书意在对这个充满着误读、盲点和过度诠释，同时又闪耀着创意、灵性和发展的非常复杂的过程进行饶有兴味的探索，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主流的历史现象，对在这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代表性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研究。首先是对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收集，其次是对误读、吸收和重建等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最后上升到对两种文化相遇时所产生的种种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和总结。

本丛书现包括以下5种：《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白璧德与中国文化》《卡夫卡与中国文化》《史耐德与中国文化》《庞德与中国文化》。如有可能，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出相关学术著作，以期更加完善、充实。

2006年10月6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自序

庞德 (Pound)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谈论庞德不得不谈的话题。凡论庞德者, 稍有深入, 必谈中国。由于欧洲中心论的缘故, 西方学者涉及庞德与中国的关系时, 一般只谈现象, 不谈原因, 往往回避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大多好考证庞德涉及的中国文史资料, 甚至出名的华裔汉学家 Achilles Fang 的主要工作也只是对庞德涉及的中国资料做诠释。整体给人的印象是庞德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是考据学的问题, 或者说是对他使用的汉字的英文训诂学。若要谈影响, 就得从费诺罗萨 (Ernest Fenollosa) 的译传谈起, 近溯日本汉学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讲解, 远溯美国近代哲人爱默生的新柏拉图主义观念, 或谈英国文学理论家休姆 (Thomas E. Hulme, 1883~1917) 的美学观念对意象派诗学形成的影响, 或谈法国象征派、意大利未来派、西方印象派、立体派等艺术流派的影响。庞德研究中的中国问题, 大概从 1917 年艾略特强调庞德的意象诗先于他的《中国诗集》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基本按西方学者的意图形成一个潜在传统: 作为现代派的奠基人, 庞德是在西方哲学和古典主义美学的基础上, 在法国象征派诗歌和意大利未来派艺术的影响下, 形成自己的意象诗学和漩涡诗学, 再按他的诗学原则筛选、创用中国文化材料。当然, 谈庞德, 就得谈他的 ideogram, 谈他的 ideogrammic 方法, 这在西方论者中也很常见, 但往往只谈其一, 不谈其二, 尤其不谈其生成的内在根本因素。

然而, 任何人细读庞德的论文、诗歌文本之后都能发现, 庞德对中国古代诗人的评价并不亚于西方最优秀的诗人, 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备至。庞德最初接触中国文学时, 就惊喜地宣称中国古籍是一块“新大陆”, 是一座“宝库”, 并预言中国古籍对于 21 世纪的西方将是“如同希腊古籍对文艺复兴一般巨大的刺激”, 甚至提出明智的大学应在教学大纲中用中文课程取代希腊文课程。这种认识成为他终身究读中国古籍的动力。庞德从中国古典诗着手, 走向对儒家经典四书 (及部分五经) 的研究、摘引、翻译, 并通过自己诗歌、论文不断阐释、倡导儒家伦理思想。庞德著作不仅有明显的儒家思想影响,

也有道家思想影响的痕迹。中国传统文化对庞德的创作、诗学、审美、伦理、信仰、思想等都有一定影响。

庞德与中国需要谈。如何谈为宜？时下似乎有种说法，比较学（comparatism）研究被文学研究吞食，而文学研究又被文化研究吞食。想想也有道理。比较学主张以他者为参照，主张跨语言、跨学科、跨地域国界，主张互文上的历史性、历时性研究，主张学理上的共时平行比较。诸如此类特征，先是被置疑，被诘难，后是被忌妒，被攫取，再后便被秘而不宣地广泛使用了。试问当下备受青睐的“文化研究”所取的不正是早先“比较文学”的主要特点吗？还是庞德说得对，历史有所延续，有所重复，改变的是表面，保持不变的才是本质。我们的学术术语日新月异，我们的学术研究又有多少本质改变？新词上总蒙着旧词的影子。难怪庞德总是“以旧创新”，这或许不失为一策略。此时再谈影响，显得十分陈旧，但披在庞德身上还不太旧。何故？庞德虽是多种语言的交汇点，多种文化的集合纽结，但他与中国文化究竟关系如何，尚不甚清楚。泛说谁影响了谁，容易。但要说什么影响，怎样影响，到底影响有多大，恐怕不易。我在这里仅就这三点试说一二。主要着眼的是中国传统诗学、儒学在庞德写作过程中的影响发生点或者影响生成情形。为说明这种影响的存在，本书专注于庞德与中国相关的文本（论文和诗歌），进行历时性研究，考察他自1912年至1937年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相遇的一些情况，并且进行共时性比较分析，考察中西诗学的共场所在，力求在历史纵向和理论横向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庞德及其现代主义诗学的影响与意义。

至于方法，窃自以为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谈方法，从元语言到元语言，玄之又玄。一种是只用不谈。我在文中取后者，故先在此稍作说明。庞德本人好比较，当为比较学一先驱；其著作兼容诸多文化传统，又当为文化研究一先行者。故而比较分析、文化视角在所难免。要说明庞德的思想、诗学观念形成的渊源，需溯本清源，思想中又有了现象学复原的意识，有（新）历史主义考察相关文化、社会互文的意识。而在这种基础上对某些歧义、成见再提出自己的看法，作出个人的解释，恐怕就会用到阐释学的方法。要说明庞德通过各种翻译媒介接受中国古籍的情况，又需要从读者接受与反应的角度分析、反省问题。历史传述说不清问题的情况也不少，又得求助文本与原理分析，便又回到所谓新批评方法的老路。总之，方法随问题需要，以说明问题为目的，而非反其道行之。以上几点就是会通本书五章的特点。

第一章主要讨论理论问题。以庞德的论文和相关理论为主，探讨庞德诗学核心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为此，追溯庞德理论形成初期的有关背景。庞德

反叛当时工业化、商业化的美国社会，反对流行的后维克多利雅雕琢浮华的文风，批评美国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以抽象、空泛的一般术语说教的美国文学教育。他因此严厉批判保守、狭隘的地方主义的美国文学批评界，迫使美国有创见的作家到欧洲去建立声誉。与此相应，庞德追求歌德式的世界文学内涵，创建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批评标准，建构普世意义的现代主义诗学原则。为说明庞德诗学的实质所在，专门探讨他的三大思想倾向：国际主义气质、共相历史观、比较学视野。并且通过庞德学术著作《罗曼精神》（*The Spirit of Romance*）、《文化导向》（*Guide to Kulchur*）中的实例分析、论证这三大特质不仅是构成庞德对其他民族文化感兴趣的首要因素，而且贯穿庞德的诗学建构和创作实践。以下各章均从不同方面反复证明庞德思想观念与诗学建构、诗歌创作的相互关系及互动意义。

第二章探讨渊源一类问题，专注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生成及其发生点。庞德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由古典诗开始，以他的“仿中国诗”为标志，以翟理思（Giles）译介为媒。这一问题多为忽视，尤其是庞德的根本动机及其意象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内在联系。本章从译介角度，以探讨中西诗学共场（common ground）为核心，分析翟理思译介的中国文学对庞德思想与诗学的影响。为此，主要从相关诗学理论、相关互文语境、史实等方面讨论庞德“仿中国诗”的问题，分析比较中西诗学中的象与像、摹仿与意象、比喻与比兴等概念以说明二者的同异。类同点说明庞德的兴趣所在；相异点则是刺激庞德模仿中国诗艺，创译中国诗，获取启迪而改进自己诗学之源。为说明翟理思译介与庞德创作的关系，特别分析讨论庞德该时期的代表诗集《净化节》。除“仿中国诗”外，还分析其中相关具体诗例，并联系讨论庞德当时创作“仿中国诗”的社会、文化语境以揭示庞德仿中国诗与他的诗学建构的深层关系。中国古典诗通过翟氏译介对庞德的创作方法、比喻模式、诗学概念等均起到示范和启迪的作用，故而是促成庞德走上中国文化考古的起点。

第三章主要探讨译传问题。以庞德早期的《中国诗集》（*Cathay*）为对象，考察他早期通过费诺罗萨遗稿的媒介，直接接触中国文学资料，接受中国诗学的情形，但主要探讨中国传统诗学与庞德现代主义诗学观念的本质关系：即中国古典诗中的现代性问题。有关《中国诗集》，庞德从费氏笔记 150 首中国诗仅选译 18 首，庞德选诗一直是庞德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中国诗集》的核心部分为考察对象，我在此提出与以前研究不同的观点：庞德选诗不是一般批评认为的以意象原则为首要标准，而是以他的“散文价值”观念为首要标准，并且是以西方诗歌传统为参照选译中国古典诗。庞德经比较参照荷马叙事史诗、奥维德浪漫抒情诗、撒克逊民谣、白朗宁戏剧抒情诗等传



统而选择类同的中国诗歌进行整理翻译。为此他主要选译三类中国诗：史诗性的叙事诗、乐府叙事诗、叙事兼抒情的仿乐府诗。就主题而言，又可分为“战争诗”和“人间诗”二类。后者可再分二类：表现爱情的“思妇”诗与表现友情的“别离”诗。进而从中国古典诗歌体裁类别的角度，探讨中国传统诗学与庞德现代主义诗学的共场所在，这其实正是庞德选译《中国诗集》的目的所在：用与他现代派诗学观念相吻合的中国古典诗示范他当时倡导的表现真实、客观、质朴、自然、含蓄、蕴意丰厚等现代“自由诗”品质。此外，通过具体实例，分析庞德如何改译费氏手稿，继而探讨他在1914年至1915年间如何拒绝、改造及接受中国诗律、诗学的情况，尤其是非联结意象并置、对偶和兴喻结构。庞德的主要目的仍是要建立一种具有国际普遍意义的现代诗歌标准，这是主导他现代化中国古典诗的首要观念。庞德选译《中国诗集》的工作致使中国古典诗得以在域外流传，其理论和实践不仅对他的时代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对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四章讨论译介和影响生成一类问题。主要探讨中国文字和传统诗学经费诺罗萨的阐释对庞德诗学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具有实质影响意义的发生点：即在庞德构思、实验他的长诗创作形式，建构《诗章》总体结构模式中形成的影响。庞德在1915年最初的《诗章》蓝图设计中拟定了两套方案：明的一套以“散文价值”概念为原则，以荷马史诗和白朗宁独白叙事的叙事模式为实践；暗的一套以他自己的意象、漩涡概念为主，实验“会意”（ideogrammic）集合模式。后者于1919年首先确定，比前者早四年。这两种结构模式基本主导了庞德以后的长诗写作，供他平行、交替、混合使用。这两套实验方案都显现了中国文化因素的渗透、参与和影响，尤其是第二套。为说明这种影响的意义，本章分别考察称之为“元诗章”的《诗章三首》和真正的《诗章》首篇《诗章四》。庞德对《诗章三首》的实验结果是放弃尝试多年的白朗宁叙事模式，用荷马史诗叙事模式取而代之。在这个实验过程中，庞德考虑到孔子“依自不依他”的思想，并且把中国传统表现特色纳入自己的“视觉诗艺”和“音乐诗艺”的范畴。1917年初庞德编辑发表了费氏的论文手稿《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文字》。此文以重视自然启示的超验哲学观，以中国文字研究艺术表现媒介，视中国文字为最能反映自然，最贴近自然法则的语言，因而提出诗歌语言应以形象为主，以隐喻为达，以自然排列而非语法逻辑等观点。费氏观点对庞德影响极大，尤其是费氏“诗优于散文”的观点。费氏论文揭示了中国古典诗的真谛，因而深化了庞德对中国诗学的理解，促使他改进原来的诗学观念，由浓缩情感密集型的意象、漩涡诗学转向情感投射开放型的“会意”诗学观念，接近中国传统“兴喻”的方法。庞德为此放

弃正在实验的白朗宁式戏剧独白模式，由叙事模式实验转到意象并列、散片并置的“会意”集合结构的实验，并在《诗章四》创作实践中形成模式，使其成为与荷马史诗叙事模式并用的总体结构形式之一。正是在《诗章四》集合结构模式的生成过程中，中国文化因素经费诺罗萨的译介、阐释进入庞德诗学的核心部分。

《诗章四》对庞德的长诗创作和诗学建构都至关重要，既是真正的长诗《诗章》的首篇，又是庞德实践、建构适合写作长诗的集合结构模式所在。其创作史复杂延宕，长达四年，其间庞德徘徊于他的“散文价值”概念与意象/漩涡概念之间，同时他的诗学观念、表现方法均发生较大变化，故为众多论者关注。我主要延续中国传统诗学对庞德影响的思路，探讨中国诗学如何参与庞德长诗写作基本模式的建构，进而说明具有意义的中国诗学影响的生成点不是在《中国诗集》的改译，而是在《诗章四》的创作。在费氏论文的影响下，庞德更加重视中国传统诗学，重视中国文化题材的运用。他在《诗章》的蓝图设计中不断从翟氏著作和费氏笔记汲取中国题材，引进了孔子、观音、庄周、琵琶女、襄王、宋玉等人物形象，采用了《风赋》《桃源行》中与诗歌风格有关的意象，模仿宋玉的赋格和王维的诗风，并以他们的诗歌风格示范自己的审美和表现的观念。此外，庞德也运用了他改译《中国诗集》形成的庞德式隽语。中国文化已经成为庞德知识的一部分，供他灵活运用。再者，《诗章四》的另一特征就是庞德在此表现出诉求一种“烟笼清漆”的中国式朦胧审美，追求一种“桃花源”的玄秘诗风。正是这一诉求使庞德由反传统的现代派诗人又回归传统。《诗章四》的创作表明庞德一反早期的做法，开始大量运用叠词叠句、意象并列、散片并置以致产生了类似中国传统叠韵复沓的声律美。因此，中国文化因素已经超越庞德早期的题材、再创作的范围，而进入他的“视觉诗艺”、“音乐诗艺”、审美观念、结构机制等范畴。因而《诗章四》的写作超越了庞德先前对中国古典诗的认识，比他的《中国诗集》的改译更加接近中国传统诗学。真正具有意义的中国诗学影响发生在庞德长诗《诗章》基本模式的设计、实验中，发生在《诗章四》的创作及其集合结构模式生成的过程中。

第五章从阐释角度解读文本及互文关系。主要分两节，分别讨论《诗章十三》和《诗章四十九》这两个特殊个案及二者之间的潜在联系。第一节探讨《诗章》儒家伦理母题的生成。《诗章十三》的分析表明，庞德已经超越早先按原文改写或再创造性翻译的方法，完全以他的创作为主导。所有《四书》的引用并未按原章句的题旨发展，而是根据他的写作需要从自己的记忆中信手拈来，加以想象发挥为巧妙的诗性表达。整体结构仍以“会意”集合模式为